介入现实与困境突围：曹征路底层叙事的知识分子立场

黄海静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深圳

【摘要】曹征路是当代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介入现实，恢复文学批判功能，体现出富有历史关怀的新左翼精神。本文以《那儿》《霓虹》《问苍茫》为中心，探讨他的底层叙事如何展现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责任。曹征路既体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底层化现实，又关注底层大众的思想启蒙。与渲染苦难的底层叙事不同，他以批判现实、突破遮蔽的话语揭示底层个体的身份困境、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试图在困境突围中寻求文学疗愈的可能。

【关键词】曹征路；底层叙事；介入现实；知识分子批判立场；三重困境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项目（GD23XZW19）；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5 年度项目（SZ2025D048）；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6 年度项目（sz2026D010)；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6 年 9 月 29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10 月 21 日　【DOI】10.12208/j.ssr.20260339

Engaging with reality and breaking through predicaments: The intellectual stance in Cao Zhenglu's subaltern narratives

Haijing Huang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Abstract**】Cao Zhenglu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ubaltern literature. With the self-conscious awareness of an intellectual, he engages with reality, restores the critical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embodies a New Leftist spirit imbued with historical concern. Focusing on his novellas *There*, *Neon Lights*, and *Questioning the Vast Land*,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his subaltern narratives demonstrate the 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Cao Zhenglu not only perceives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s and the subalternized reality of intellectuals, but also attends to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of the subaltern masses. Unlike those subaltern narratives that merely accentuate suffering, he employs a discourse that critically engages with reality and breaks through obscurations to reveal the identity predicaments, existential predicaments, and spiritual predicaments of subaltern individuals, seeking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ry healing in the process of breaking through these predicaments.

【**Keywords**】Cao Zhenglu; Subaltern narrative; Engagement with reality; Critical stance of intellectuals; Triple predicaments

引言

曹征路是当代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中国的“小林多喜二”[1]。2004 年曹征路发表中篇小说《那儿》，引起当代文坛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曹征路的底层小说打破了新世纪“底层写作”的沉寂局面，并引发了关于“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等话题的深入讨论。曹征路小说之所以具有持久感染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以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借助文学话语拓展了表达的边界，恢复了文学介入现实、反思人生的功能，从而在关注底层、回应时代的同时，体现出一种富有历史关怀的新左翼精神。

在曹征路的小说中，我们能够清晰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与自省。作者试图运用这种高度自觉的精神和认知，突破被遮蔽的话语，深刻把握现实，直抵中国社会的底层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扩张与商业逻辑的渗透，知识分子遭遇了新启蒙理想挫败与后现代思潮涌入的双重冲击，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开始走向分化，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边

缘化处境。曹征路体察到了这一群体的身份焦虑和精神困惑，并准确把握了“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弱势群体”[2]，“底层问题就是中国问题，底层困境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困境”[3]的时代症候，再现了1990年代部分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拜金拜权”的痛苦之后，“精神完全溃败”，“主体意识完全消失”[4]的底层化现实[5]。这使得他的作品折射出深切的现实关怀、人文温度与反思精神。

1 介入现实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

所谓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一面指向官方及其意识形态，要求与权力平等对话；一面指向大众，要求引导、启蒙[6]。曹征路的底层写作，无论是叙写底层的苦难生活，还是表现底层的精神困惑和人性反思，都始终铭记自己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对世界抱有赤子之心、对人类境遇怀有悲悯情愫”[7]。一方面，他关注底层大众的思想启蒙与自我成长；另一方面，也直指部分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中理想与责任的迷失，以及在功利主义面前沦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倾向。曹征路底层写作的叙事姿态与他的知识分子立场一脉相承。他始终以介入现实的方式来开启人格独立的批判立场，而这种立场又建立在揭露外部社会遮蔽与审视内在人性精神的双重基础之上，实现了知识分子底层叙事话语的在场性与互文性。

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知识分子科层化、专业化趋势的加强，部分知识分子的关注重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曹征路敏锐察觉到：“只有那些与个人利害相关的事物才是他们关注的目标。他们生活精致，兴趣广泛，有全球意识和商业头脑，他们的中产阶级趣味和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在高校文学课程中的话语霸权，都有意无意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走向。”[8]这些表面精致高尚、实际个人利益至上的知识分子，成为曹征路笔下的重要审视对象。同时，曹征路的知识分子批判话语与他的自身经历形成互文。《南方麻雀》围绕大学知识分子在学校发展和个人利益之间展开的博弈，借用“打麻雀牌”的规则“看清上家，卡住下家”来隐喻一群知识分子将学术殿堂变为权力场的情形。钟健是S大党委书记，“有文凭”但“没文化”，不懂办学却深谙官场套路，凡事喜欢突出自己，成天在班子里搞论资排辈，强行把自己的选修课变为必修课；为了配合上级领导，让学生停课参加赠书仪式；为讨好市委领导，任意篡改学生成绩，导致学校声誉受损。辛校长在大学工作多年，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刚来时他对钟书记的做法不满，后来在政治环境中逐渐磨平棱角，变得圆滑世故，最终与钟书记同流合污。他一心想要办好S大，却无奈处处受制，最后被圈套陷害丢了职位。经济系教授刘宾儒是“媒体经常追逐的人物”，却也不甘心只做一个大学教授。他表面上帮助龚副校长，实际是想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在龚副校长被算计后成功升任省政协常委。中文系副教授侯川是一个打着鲜明时代烙印的知识分子，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他家庭出身不好，为保住工作，不惜与父母划清界限，写了大半辈子检查以示清白，导致性情古怪。在身边的人一个个追名逐利之时，唯有他坚守在教学一线。因自己课上的学生被钟书记拉出去接待领导，他彻底爆发，去办公室大闹了一场，最后还没等到钟书记的处分就晕倒在讲台上，不久离世。曹征路以一种知识分子在场性的话语，生动呈现了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变。在这篇通篇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中，作者内心的情感是复杂而深沉的，情绪是激动而痛心的。他并不愿把自己同侪写得如此不堪，因而他总是紧紧抓住知识分子挣扎的心理轨迹，同时也不回避知识分子道德底线所应该承担的后果。曹征路在介入现实的同时，又敏锐地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现象一一呈现，“他对知识分子底层化问题的思考令人耳目一新，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立传的意义。”[5]

曹征路的底层写作接续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以犀利的笔触揭露底层思想中的麻木、愚昧、落后等劣根性，以此激发大众的启蒙意识，并试图引导大众在抗争中完成自我救赎，这也是他知识分子立场介入现实的一种重要方式。《那儿》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一部“工人小说”，定位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①。但作者却有意提醒读者，“《那儿》是‘小舅’的故事，更是‘我’的故事。”[9]诚然，如果从“我”的视角来阐释《那儿》，“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经历“小舅”抗争和妥协后，“我”辞去报社工作去打工，通过“小舅”“背叛与承担”的故事获得启蒙，具备了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如此看来，《那儿》也可以解读为反映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小说，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和选择。曹征路的底层小说揭示了复杂时代导致知识分子精神转变的必然性，但

① 不少评论家将《那儿》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可参见吴正毅、旷新年：《<那儿>：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第14-16页；旷新年：《曹征路“底层写作”意义的再认识》，《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第124-135页。

他更希望借助文学的形式来实现知识分子有情有义、有尊严的审美理想。因此，通过一种充满悲悯情怀的知识分子立场去感受底层人民真实的苦痛，是他介入现实的有力方式。与之相比，他的中篇小说《豆选事件》将视野从城市转移至乡村，表达了对愚昧落后的传统乡村伦理的强烈批判。小说围绕方家嘴子的乡村选举，揭露了乡土各方势力之间权利和利益的争夺。在这场乡土民主化进程中，底层民众却欣然接纳当权者的金钱贿赂，不惜将民主权利肆意践踏，方继武试图唤醒民众、捍卫公平，却在劣根性顽固的乡土伦理面前成为牺牲者。曹征路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深切关怀乡土中国的现实，并试图唤醒传统乡村走向现代文明的意识。对此，孟繁华认为，“曹征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书写，对乡村中国全部复杂性的理解，是这个时代最具是非观和正义感的文学。”[10]

2 揭示“三重困境”的底层叙事

近年来，以曹征路为代表的“底层叙事”在文学界引发诸多讨论，焦点在于这种创作是否延续了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支持者认为“底层叙事”汲取了左翼思想，提出“复苏说”“继承说”等观点；但它又不等同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继而又有“新左翼文学”的提法，将它视作是“左翼文学”在当代延续和衍生。总之，支持者纷纷寻求左翼文学与当下底层文学的“合法性”关联，试图重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为文学史的延续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而反对者则认为左翼理论资源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已经发生断裂，甚至终结。笔者认为，“左翼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无疑给底层写作以重大启示和现实意义。然而，通过分析曹征路的底层小说和他的创作契机，笔者认为，曹征路的“底层叙事”更应该是一种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自觉实践，是他对时代困惑做出的一种反思、回应和有态度的表达。在这种自觉实践的过程中，作者无意识地表达了一种充满性情和血气的左翼精神，但它归根结底仍是一种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正如曹征路所说：“在我的理解中，这些文学应该是一种精神姿态，一种看待事物的眼光，一种生活方式的历史哲学。……关键在于它是不是介入的，批判的，抗争的，人民主体性的。如此说来它对左翼思潮的复兴与发展也一定是有积极作用的。”[11]

与其他突出人道主义情怀和渲染苦难的底层叙事不同，曹征路以一种批判现实、突破遮蔽的话语来揭示底层大众的身份困境、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他希望文学可以“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寻求一种困境突围的方式，在同现实的抗争中呼唤一种有理想和有尊严的生活。本文着重从《那儿》《霓虹》《问苍茫》三篇小说来探讨曹征路的底层叙事如何揭示全球资本时代下个体的身份困境、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

2.1 身份困境

《那儿》描写了矿工机械厂工会主席“小舅”的抗争悲剧。“小舅”为了阻止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资产流失，四处上访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组织下岗职工进行反抗，但抗争以失败告终，“小舅”再次背负“背叛”工人的罪名，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承担”后果以证清白。造成“小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法摆脱的身份困境。“小舅”是矿机厂的“天才技工”，“车钳锻铆焊没一样不精通”，凭借出色的“腰锤”绝技被评上省劳模，又“被迫”提拔为厂里的干部。但他对“干部”身份并不满意，内心只认同他的工人身份，只想做一个“高级技工”。“小舅”陷入身份的两难境地，他竭力表明自己的工人立场，但“工人只拿 128 元最低生活保障”，他却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即使“员工购股”的当晚出台 29 号文件，工人们的“红本本”都付诸流水，他名下却还可以拿到 3%的股权。因为这个干部身份，他犯过两次错误：一次是用工会主席身份动员工人集资买岗位，结果集资款全打了水漂；另一次是动员职工同意将国有企业转私营公司的收购方案，却被对方空手套白狼，工人利益严重受损。可“小舅”依然是企业改制中的受益者，被视为“猪主席”“坏领导”，彻底失去了工人们对他的信任。

直到亲眼目睹曾经喜欢的女徒弟杜月梅在生活重压下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小舅”才意识到“他不能不对这个女人，还有跟这个女人一样的工人负起责任”，这激起了他要为工人奋力一搏的决心。杜月梅是“小舅”情感结构中的关键人物，推动着小说情节发展，并激起了“小舅”一次又一次的“崇高行为”：送走义狗、省城上访、员工购股。杜月梅的生存境遇以及她与小舅之间的情感纠葛，使“小舅”身上潜藏的理想、公平和正义的力量得以爆发。

“小舅”去省城上访，历经各种险难：被市委领导“鸿门宴”、材料被偷、身无分文等，但这些挫折反倒令他越挫越勇。他宁可在北京工地拌砂浆、扛麻包、修自行车；从小不爱学习的他，却在关键时候把“三四千字的文稿，几十个数据”的上访材料背得“只弄错两个标点符号”，誓要把状告到底。支撑“小舅”面对困境的，是他内心深处的工人身份认同和正义信念。他把工人阶级视为兄弟姐妹，相信工人阶级有地位，要为矿机

厂工人们争取合法权益。

然而，在全球资本时代，人的身份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逐渐失去单一的认定标准，变得多元和不确定。这种身份认同的分裂感和迷茫感，成为时代之于每个人的普遍困惑。“小舅”身处 1990 年代，正是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新旧体制矛盾突出的时期，这种剧烈变化加重了身份错位感。“小舅”以为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以为“工人阶级一家亲”，殊不知“英雄纳特耐尔”的理想、正义、公平的精神早已消失殆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小舅”和下岗工人分属不同利益群体，彼此的身份立场存在差异，“已经丧失了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丧失了联合起来的伦理纽带”[12]。

“小舅”自认为代表工人阶级，但在上访路上就遭到一个美国博士质问：“不要动不动拿三千人说话，你能代表三千人吗？组织上怕你吓唬吗？”一切正如美国博士所料，“小舅”上访归来想团结工人签“倡议书”，抵制卖厂。他见人就讲形势严峻，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上门促膝长谈，讲到眼睛充血、嗓子喊哑，可大家就是不签名。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为工人利益奔走，却得不到响应。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连“小舅”的师傅都不相信他说的话，认为他“坑了厂里多少人”，这让“小舅”救厂图存的理想近乎熄灭。

小说对“小舅”身份困境的抗争以四条线索交叉展开：第一条是“小舅”代表下岗职工与不公现实的抗争，是所有抗争中的主线，也是最激烈的一条叙事线索；第二条是“小舅”上访与以美国博士为代表的省市官员之间的抗争；第三条是“小舅”与叙述者“我”之间情感与思想的抗争，这条线索是与第一条主线平行，“我”的态度变化在小说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条是“小舅”与世俗人情的抗争，主要包括“我妈”“我爸”“月月”代表家庭伦理以及具有普世价值观市民之间的抗争。

《那儿》不仅是“小舅”的故事，更是“我”的故事，这是作者创作的本来意图。小说中叙述者“我”与“小舅”之间的情感和思想从抗争走向对话，点亮了小说“背叛与承担”的主题，赋予了这篇小说“工人阶级反思文学”和“知识分子启蒙文学”的双重内涵。小说描述了“小舅”和“我”的深厚友情，这段友情一直延续到小舅二十八岁结婚生女才告一段落，也为后来“小舅”选择同“我”这样一个小辈倾诉困惑做了铺垫。最初“我”对“小舅”上访的想法感到“二十分可笑”：“就算你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把工厂当成自己家的人，又有谁信？就算你把这个事搞成了，又有谁来感谢你？”[13]“我”质疑“小舅”的抗争，认为他的行为荒唐可笑，这其实与作者和读者的心理同步发展。小说中“我”的知识分子立场和作者立场是一致的，表明作者一开始也不相信“小舅”会有这样的举动。但随着“小舅”抗争的深入，“我”慢慢理解“小舅”追求正义、理想和公平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印记。“我”开始受到影响，也“染上了某种宏大的毛病”，开始焦虑，“额头像皮带轮子一样深刻起来”，并且“居然相信小舅能带回一点好消息来”。在“购买股票”事件失败后，“我”恳求报社同事报道“小舅”的故事，希望可以扭转大家对他的看法，但遭到同事的嘲笑。“我”彻底看透了报社知识分子的虚伪，受到“小舅”的启蒙，选择辞职打工，去追求真实的当下。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我”身上明显带有作者的话语言说方式，“我”的迷惘和挣扎，其实就是作者对于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困惑。“小舅”选择以死证明清白，最后矿机厂把职工房产证退给大家，空手套白狼的港龙公司撤出矿机厂。这样的结局，“我想，小舅这回该瞑目了吧”。作者对“我”思想变化的描述，遵循了一条符合生活的逻辑，推动着“我”的情感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保持一致，使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显得真实可信。

小说中的“义狗”罗蒂是对“小舅”命运的一种“同构性”象征隐喻[9]。罗蒂的命运象征着小舅从抗争走向妥协的过程。小说开篇就是“义狗”罗蒂狂吠两下，吓瘫了在霓虹灯下做“哨兵”的杜月梅，“裙子都尿湿了”，“一脸的脂粉已经千沟万壑被泪水冲得不成样子了”[14]。“小舅”知道后去看望杜月梅，看到昔日那个快乐单纯的女人，如今老公车祸过世，孩子生病住院，为了生存沦为娼妓，这让“小舅”很受伤，并做出了一个他认为正确明智的决定：第二天晚上亲手将罗蒂送走。罗蒂的执着和抗争是对“小舅”性格的一种隐喻，罗蒂的悲剧预示了小舅的结局。罗蒂本是一只流浪狗，跟着“月月”进了家门。后经宠物贩子介绍，才知是一只纯种德国黑背，“自从明确了身份，就越发显得优雅高贵”。罗蒂忠心于“月月”，其实它也是忠于自己归属的身份，“它只相信一条，它只有一个家，只有那一种气味才是它需要的，只有那一个人才是它的朋友。”[15]它为了寻回自己的身份，不惜跑了二百多公里，历尽千辛万苦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但再次看到编织袋时预感又要被送走，绝望地从龙门吊上跳下身亡。罗蒂把“自己的天灵盖都撞得粉碎”，这和“小舅”自杀把自己头颅都撞没了形成“同构”。罗蒂的死进一步升华了故事的情感结构，

暗示“小舅”的抗争从一开始就充满悲情色彩。

2.2 生存困境

《霓虹》是《那儿》的姊妹篇，它将《那儿》中未充分展开的杜月梅的生活，以倪红梅的故事重新讲述出来，补全了下岗女工沦为妓女的生活图景[12]。曹征路以男性知识分子的视角来勘探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复杂内心，揭示了她们在生存压力下道德选择背后的社会现实。

《那儿》中的杜月梅在霓虹灯下做“哨兵”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如今下岗女工靠上一个拉边套的并不稀奇，毕竟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霓虹》中的倪红梅走上这一步，也是为了最原始的生存本能——活着，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身边尚且活着的人。《霓虹》以日记体形式描述了倪红梅为生活所迫走上暗娼之路，内心无时无刻不被复杂、矛盾、焦灼的情绪包裹，却因两百块钱假币被嫖客掐死，反倒让她彻底解脱，走出了生存困境。倪红梅的日记是一本苦情女人的自白书：父亲为挽回工厂损失而丧生火海，换来了她顶替进厂；老公工伤早逝，没拿到厂里一分钱赔款；女儿生病住院，婆婆瘫痪在床，她又下岗失业。家里的劳动力都不在了，倪红梅成了维持家庭生计的唯一支柱。她曾挣扎过，卖过早点、当过保洁、端过盘子、做过按摩，但收入远不够女儿的药片钱。如果她还坚持要尊严，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去死。倪红梅的苦情身世在她死后警察的侦察日志中得到印证：“据反映，该女性情温和，与邻居关系良好，群众对其卖淫事实也不反感。主要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太差，婆婆瘫痪多年，女儿亦住院多次。”

而真正让倪红梅彻底冲破道德底线和心理防线的，是一个像她父亲一样尊敬的人，却把她当成了“商品”。倪红梅在做按摩妹时，遇到父亲曾经的朋友，如今成了“大人物”，说要帮她一把。她满心期待，可没想到这样一个给她希望的“上层”人物，帮她的方式只是把她当成妓女，在满足情欲后付了“五百元”，相当于她半个月的工资。在商业资本时代，阶层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这种身份等级意识使“上层”对“底层”缺少真正的关心。小说中这位“上层”对倪红梅的帮助转化为金钱与肉体的交易，充分暴露了商业社会的某些本质。这一次，倪红梅心里道德筑起的城墙彻底崩塌，她意识到，唯有走进霓虹闪烁的世界，才是挣脱生存困境的出路。

“霓虹灯”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充满了象征意味。倪红梅出租屋的西面和北面对着巨大的霓虹灯电子屏，这使她的房间有些不同，她的房间不需要灯。当华灯初上，霓虹灯闪烁得让她睁不开眼的时候，她这头黑夜动物就要开始工作了。霓虹灯广告的逻辑和她的生活逻辑何其相似：

“这东西是好看，有一个是卖内衣的，那女的把外衣一件一件脱掉，脱到内裤的时候把屁股撅起来问，想要吗？那简直就是在为我们做广告，只不过地点是沿河街出租楼。”

“霓虹灯”是资本时代的商业文化符号，是现代化的标志。霓虹灯广告在兜售商品的同时，也在挑动着人们的物欲和情欲，但这些诱惑多为上层社会的男性而准备，他们有条件获得霓虹广告许诺的幸福。这种幸福正是鲍曼所说的消费主义的欺骗性，“它允诺的是一种幸福的普遍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也就是说，人们被同样允诺进入消费主义的商店，他们同样被允诺得到幸福，这是欺骗性之一。”[16]霓虹广告与“倪红梅们”的不同在于，前者提供了一种商品的想象，后者则是把自己直接当作明码标价的商品。“霓虹灯”让倪红梅多次想到老舍《月牙儿》里那对沦为娼妓的母女。《月牙儿》反复渲染的月亮和月光，是母女绝望时的精神寄托，表达了对纯净生活的向往。老舍笔下的月光美得让人动心，恬静得令人沉醉。显然，《霓虹》的叙事借鉴了老舍的《月牙儿》，只是这闪烁变幻的霓虹灯，不断勾起欲望，让人无暇顾及月光。曹征路并不避讳叙事上的借鉴，将《月牙儿》的叙事融入小说，通过倪红梅日记来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了他像老舍一样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给予底层大众更多的人文关怀。

《霓虹》在创作手法上延续了曹征路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在表现形式上又有所创新，采用日记体、勘察报告、侦察日志、谈话笔录等多种的形式。倪红梅日记是小说的内在主体，用第一人称女性口吻自叙心路，充满细腻的情感色彩。其他形式是小说的外在框架，理性冷峻地从外部世界介入倪红梅自杀事件，叙述极为简要。二者构成情感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现实与秩序的对比，棱角分明地将两个世界并置在一起。前者是底层女性的现实与情感世界，后者是执法者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世界。这两个原本并行不悖的世界因“倪红梅死亡事件”而关联，真正连接它们的是作者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情感投射。珠三角出租屋里有着无数的“倪红梅们”，类似事件几乎天天上演，早已不具备多少新闻价值。但曹征路以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介入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把对“倪红梅们”的关注和同情嵌入冷酷的社会法治事件，他的批判视角不限于悲剧本身，而是要揭示酿成女性道德选择背后的社会真相。“小说文本形

式的断裂暗示出当今社会阶层的断裂与知识分子的位置。”[12]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出现严重分化，知识分子群体也呈现科层化趋势。曹征路见证了这一群体的精神转向，也介入了他们的精神处境，因此，他希望以知识分子的立场介入和关怀底层民众，将底层民众视为有尊严和价值的主体，与之建立平等对话关系，并为修复、弥合这种社会断裂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倪红梅日记中唯一记录的嫖客老梁头，曾给她带来过一丝希望。老梁头代表社会断裂分层下精神孤独的一类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同情倪红梅，想用人道主义情怀拯救她，但这种施救经不起考验；另一方面，他对倪红梅的同情也是出于“老了太孤单”“儿子媳妇只把他当提款机”的真实投射。他并没有真正把倪红梅看作是有尊严和价值的主体，因此他们之间只是商品交易关系，高高在上的同情无法帮助倪红梅摆脱生存困境。

小说还描述了与倪红梅境遇相似的阿红、阿月和肥肥们。她们就像倪红梅的镜子，每个暗娼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只是她们和倪红梅的故事相比，悲情色彩显得寡淡很多。肥肥靠出卖肉体养活吃软饭的老公，老公还想出去嫖娼，两人打得天翻地覆，最后选择原谅，回家乡开始新生活。阿红十五岁出来做二奶，生了个儿子，儿子却成了父母的人质，逼她卖淫供弟弟们上学。她每晚惨叫，梦见回家却回不去，梦里想抓住什么却抓不住。梦是生活的镜像，阿红们即使在梦里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些社会底层女性，她们拼命想要逃离生存困境，成为一个有尊严和价值的人，可她们身后却有无数羁绊和牵扯的力量，使她们再次沉沦，永远活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的暗处，终究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就像倪红梅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们这些人，谁都是谁的影子，谁也都是谁的镜子，我们永远走不出自己。”

2.3 精神困境

《问苍茫》是曹征路叩问全球资本时代精神归宿的一部反思之作。小说从整体上描绘了时代变迁下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精神面貌，展示了复杂时代作用于每个阶层的鲜明精神印记。小说延续了曹征路底层叙事的现实主义原则，同时在叙事中赋予了新的内涵。作者并没有给出“谁主沉浮”的答案，而是从全球化背景下管窥深圳的浮世绘，呈现并还原了现代人种种精神困惑。作者坦言揭示只为“引起疗救的注意”，即使充满悲悯也无法解开这些困惑，只有静待历史回答，体现了作者面对社会现实自觉而真诚的文学实践。

《问苍茫》立体式地展示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全景，塑造了全球化语境下三种阶层的“深圳人”形象：第一种是上层社会的老板形象，以文念祖、陈太等为代表的公司高层领导；第二种是介于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知识分子形象，以赵学尧、常来临、何子钢、马明阳等为代表的商界和政界的知识分子；第三种是社会底层的打工者形象，以柳叶叶、唐源、毛妹等为代表的“打工一族”。而在这三种阶层中，知识分子的形象最为典型。作者通过不同视角展示这些知识分子在剧烈社会转型下的焦虑、困惑和挣扎。赵学尧原本是思想淳朴、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闯荡深圳成为幸福村乡镇企业文化顾问后，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思想逐渐腐化，为利益将著作权拱手相让，是知识分子在权力和金钱诱惑下转变的典型。大学生马明阳毕业后在深圳宝岛电子企业人力资源部做负责人，为了钱向上谄媚、向下剥削，“两张皮”做人，对领导百般讨好，甚至迫害未成年处女“献身”；对打工者百般刁难，克扣试用金，中饱私囊，是一个表里不一、思想庸俗的知识分子。何子钢研究生毕业后成为政府部门公务员，一心想走“仕途”，工于心计，分房时以大换小，为的是离领导家近方便走动；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和老师赵学尧合谋将资质欠缺的民营企业家文念祖“包装”成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兵，还背地里算计赵学尧，把赵的著作权换成文的名字，彻底在权力欲望中迷失自我。常来临是小说中一路尴尬走来的知识分子。他原为国企书记，国企倒闭后到深圳打拼，进入宝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企业“书记”。他一开始情感和立场是偏向工人的，在工人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第一次帮总经理陈太处理劳资纠纷时，他为工人们争取了部分权益，这让他很有成就感。此后他更加主动靠近工人，和工人谈心，关心工人们的生活，逐渐得到陈太赏识。此时他情感天平也发生了倾斜，暗自琢磨资本的游戏规则，幻想将打工者和老板结为“利益共同体”，并试图充当这两种阶层的中间“调解人”。事实上，当他帮着老板去劝说和哄骗工人时，工人们对他的信任日渐减少。最后陈太撤资潜逃，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他又再次将情感天平倒向工人，鼓励工人罢工，被公安以组织煽动罪拘留。常来临边缘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尴尬处境，他一直在两种难以融合的社会阶层中挣扎，试图用“和稀泥”的方式来化解利益纠纷，最终成了替罪羔羊。

曹征路用他的如椽之笔揭示了俗世众生皆苦的本相。《问苍茫》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难以言说的精神困境和生存焦虑，作者在立体呈现这些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同时，以知识分子的立场进入他们的内心，给予深切

的体恤和悲悯。老板阶层中形象塑造得最为丰满的是台商陈太。她几乎集合了新时代女性的美好特质：年轻气质、时尚优雅、温柔多情。她白手起家，尝尽心酸苦涩才赚取人生第一桶金；作为女资本家，为了维持两千多人的企业运转，她一方面独自经营公司，奔波劳碌进货签单，另一方面靠试用期解雇工人剥削劳动力，赚取差价。她会用温情软化员工关系，为给司机挑选生日礼物跑遍全城。但面对工人毛妹严重烧伤需要工伤赔偿时，她的态度又超乎寻常的冷酷无情。可见，她依然是现代文明的资本家。一旦利益受损，便暴露趋利避害的本性。这解释了她为何在弟弟生病、罢工风潮、资金周转等问题出现后选择撤资潜逃。柳叶叶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有主体意识的新工人形象。她起初并不具备这种意识，反而要以丧失主体性为代价才能获得成长机会。她与几个贵州姐妹以被“开处”的方式换取深圳“入场券”，柳叶叶因常来临免遭一劫，从而对常来临心生感佩。在第一次罢工时，她对站在工人立场的常来临产生了一种亲切和感动的爱慕之情，以至于越来越崇拜常来临，拒绝了其他人的追求。在工作中，她慢慢有了自我意识，写出了像安子一样“人人都可以当太阳”的女性打工宣言。在一次劳资冲突中，她逐渐认清常来临身上的游移不定，幡然顿悟自己和常来临并非同一类人。

真正把这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的是曹征路运用的复调叙事手法。“复调”是巴赫金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特征而创设的小说理论。巴赫金认为“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17]，并且“小说正是通过社会性杂语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来驾驭自己所有的题材、自己所描绘和表现的整个实物和文意世界。”[18]巴赫金进一步指出陀氏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9]小说将多个各自独立且不相融合的内容统一于某个事件下，每一条对话链条上都是不完整和未封闭的，从而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问苍茫》的叙事线索有四条：柳叶叶的成长史、常来临的挣扎史、赵学尧的堕落史、文叔的涅槃史，它们都“晾晒”在劳资关系的“时代命门”下。作者将三次罢工作为舞台背景，三个层面的人物是舞台的主角，而这些人物又分布在舞台的不同位置，各自活动没有交集，直到最后这三组人物构成的线索才略有交叉重合。在叙述过程中实现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相互离间，采用了复调小说的叙事结构。作者将叙事针脚绵密地层层铺垫在人物的心理层面，不是借外部主观人力来干预人物性格发展，而是用人物自身的精神成长作为叙事的推动力，并采用限制性叙事，个人的视角和语言以及日常化的细节描写，才得以完成这篇小说的宏大叙事[20]。

无论在叙事还是构思上，《问苍茫》都体现了对一般底层写作的超越。它写出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下各个阶层的精神困境和时代焦虑。在这个资本恣意横行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无论是商人、知识分子还是农民，都面临着依附于资本，甚至被资本层层规约的精神危机。然而，曹征路以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和悲悯情怀俯瞰苍茫大地，发出不确定的精神追问，正是为了引导我们对眼前这个以资本为轴心的时代做出理性思考和正确回应。

3 结语

概而论之，曹征路以一种介入现实的方式开启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揭示了当今中国各个阶层面临的身份困境、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他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责任，正如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追求，“在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21]在这个浮躁喧哗的时代，曹征路将视角转向社会底层，敢于用知识分子的话语突破表达的困境，恢复文学介入现实、反思人生的功能，以此揭露时弊、抵达人性、启蒙灵魂，努力完成着反思时代、文学与自我关系的精神命题。

参考文献

[1] 贺绍俊.中国的“小林多喜二”在追问——读《问苍茫》[J].文艺争鸣,2009(04):25-29.

[2] 曹征路.曹征路文集·随笔文论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40.

[3] 曹征路.曹征路文集·随笔文论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246.

[4] 曹征路.曹征路文集·随笔文论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159.

[5] 吕玉铭.“叽喳的麻雀”和“折屏的孔雀”——曹征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解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01):128-131.

[6] 楚玉洁.曹征路“底层小说”的叙事研究[D].深圳:深圳大学,2017:12.

[7] 曹征路.曹征路文集·随笔文论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112.

[8] 曹征路.期待现实重新“主义”[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

(03):78-86.

[9] 本刊特约记者.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02):17-23.

[10] 孟繁华.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7 年中篇小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 8.

[11] 本刊记者.立场、审美与“动态的平衡”——曹征路先生访谈[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03):24-30.

[12] 张永峰.论曹征路的“底层叙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03):31-36.

[13] 曹征路.那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59.

[14] 曹征路.那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40.

[15] 曹征路.那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75.

[16] 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

[17] 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9.

[18] 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1.

[19]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 5 卷)[M].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

[20] 曹征路.生活之树常绿——兼答“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J].南方文坛,2009(04):67-70.

[21] 曹征路.曹征路文集·随笔文论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226.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